



民国时期清华文献购置制度的运行机制、成效及启示

□董琳*

摘要 自1915年清华开始出现推荐购买文献的活动,到新中国成立前,以教授决策购买为主体的推荐文献购置制度在清华运行了三十四年。通过对民国书刊文献、校史档案及清华图书馆藏购置文档的深入整理与研究,分析了民国时期清华文献购置工作的运行状况、机制和运转成效,阐述了对现今图书馆采购工作的启示。

关键词 文献购置 文献推荐 民国 清华

分类号 G253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1.06.018

1 前言

民国时期大学图书馆采用较为灵活的推荐购买文献制度,既符合图书馆现代科学管理理念,又顺应大学发展需要,是民国时期图书馆文献采购工作的重要特色。一方面,以清华^①图书馆为代表的现代图书馆开始建立购书预算制度,有目标、有计划地购置图书;西方大学“教授治校”的理念渗透到图书馆,教授开始参与图书预算支配、图书推荐购买和审批决策工作;另一方面,清华历经了办学理念的调整、行政隶属关系的改变、大学改办、研究院和学系创办、预算制度确立、办学经费高低起伏和南迁合组西南联大等有关学校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周诒春、梅贻琦等几代校领导,戴志骞、洪有丰、朱自清等多位图书馆主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著名教授,在清华的建设过程中以图书购置为必须,通过增加经费、设置配套管理制度、积极参与购书决策等方式支持文献采购工作;此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清华改办大学、建立新学系,藏书不足供学术研究之用,“当此之时,国学书籍,尚有收藏家愿廉价出售善本者,而欧洲自大战以后,亦有大批绝版有价值之书出售,正吾人收集此种书籍之时^[1]。”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 school 环境下,教授决策为主体的购置制度产生并逐渐发展,在支撑教学、科研和保护国家珍贵文献等方面成效显著。

民国时期,清华的专业文献购置流程是,先推荐或介绍,经校长、图书委员会成员、图书馆主任、系主任等教授审批后,由图书馆采购。普通书刊则基本上由图书馆直接购买。此时清华的文献购置制度具有“教授决策为主体”和“推荐购买”的特点。目前,学界未见探讨民国时期文献购置制度运行情况的成果,已有的相关研究集中于当下图书馆的购书工作。若想更加全面地认识文献购置制度在民国时期大学中的地位 and 作用,不仅要对其发展脉络进行梳理,还要在对历史文献和实物资料加以分析提炼的基础上,把握制度的运转状况、运行方式及执行成效,以期对现今图书馆文献采购工作提供可执行的经验借鉴,这是本研究的主要着力之处。

2 购置制度的运行状况

清华的文献推荐购买活动早在1915年已经开始,走过雏形期、调整期、稳定期和定型期,最终发展成一项校级制度,得到校内外相关机构、人员的广泛认可和参与,至1935年朱自清任图书馆主任时,全校一年的推荐购书预算已占总购书预算的90%^[2],推荐购买已经成为图书馆文献采购的一种主要形式,延续运行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

然而,购置制度的运行并非一帆风顺,过程中不断受到学校变革和使用者的批评等负面冲击,但整

* 董琳, ORCID: 0000-0002-8063-8973, 邮箱: donglin@tsinghua.edu.cn.

① 清华大学在民国时期经过清华学堂、清华学校、国立清华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复员后的清华大学五个主要发展阶段和学校名称的变化,文中将其统称清华。



体来看,那些历史转折和矛盾问题成为制度向好发展的契机,推动文献购置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现列举几例购置工作中曾面临的问题及处理办法,以示运行之艰难。

(1)经费短缺。1919年,清华购书预算增加至两万元^[3],数额是1914年的四倍,经费的增加带来推荐购书工作的繁荣,荐书参与人由科主任扩展到校内教员范围^[4]。1921年清华全面进入经费困难时期^[5],购书预算大幅下调,1923年3月23日清华校内新闻,“该馆本年经常预算只批准一千元,所有用度均力从节俭^[6]。”应对此变故,图书馆主任戴志骞判断并倾向性将中文书作为购书重点,但购书经费缺乏造成的更广泛的不良影响依然存在:教员在未知经费不能支持的情况下,依旧将大量的购书信息投入图书馆中,图书购置陷入了一种“荐”而不能“购”的局面,缺乏合理购书规划的问题日渐显露。

(2)缺乏选书标准。图书馆选书困难,“惟学校图书馆之选购书籍最易受各科教授之指摘,盖学者往往对于一书之学理,观点各异,故选择时取舍亦有不同。即同科之教授,其所选书籍亦难得其余多数之同意,此殆各大学教授选择图书之常情也^[3]。”针对教授提出的选书质疑,为避免采购书籍偏科,图书馆最初采用的处理办法是充分利用“图书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各科推荐并覆盖全校所有学科,购书预算的支配及购书事宜都由该委员会负责,以平衡各科专业图书的选购需要^[3]。通过学科教授组成的“图书委员会”控制选书买书,旨在满足“学系需要”和提高“馆藏质量”,此两点无形中成为图书馆未成文的选书指南。

(3)缺乏统筹协调。缺乏统筹及其不良影响在学系内部和学系之间都不同程度存在。1926年,戴志骞指出学系内部缺乏购书统筹的问题,“惟有数科之教师,人数甚多,若各人直接介绍,遂发生无统系之流弊^[7]。”1932年,《清华周刊》报道,“去年曾有几份全份的申报,大公报等报纸要求学校收买。据说这是属于历史方面的事物,应由某系单独购置。结果某系经费不够不能买,其他各系因为不相干予以拒绝,这几份可宝的现代史料终于失之交臂^[8]。”学系内部缺乏统筹的问题势在必改,改革突破口在于以学系为单位进行推荐购买和购书预算的管理,“各系教师即可介绍需购书籍于各学系会”“所需添购新书之预算,由各系自行规定,提交校中最高立法机关

通过”^[7]。此法更贴合学科需要,也能有效避免选书偏科。1926年4月15日,清华学校组织大纲明确规定学系主任有审定本系图书购置的权利和责任^[9],为购置办法顺利按学系统筹和实施提供了组织和人员保证。针对学系之间缺乏统筹的问题,图书馆在实际采购中采用了学系合购、特批经费、经费周转等办法。

3 购置制度的运行机制

图书馆主任戴志骞、洪有丰都曾撰文描述过清华的文献购置流程和经费使用情况,《清华周刊》《清华学校校刊》中散见有关民国时期校内图书馆文献采购和推荐文献的报道,清华校史馆中存有自国立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复员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清华图书购置及付款办法、预算及开支记录、采购批文等档案文件,民国馆史文档中存有1915年到1937年的购置书单、信函、订购单、发票等实物资料2000余套。上述历史资料基本覆盖了清华文献购置在民国年间的各发展时期,下文主要据此复原与探究清华图书馆购置工作的运行机制。

3.1 经费情况

在众多影响因素中,经费与文献购置工作各环节的关联作用最为密切。众皆以为清华依赖庚款等资助名目,经费一向充裕,实则不然,只是比较国内其他大学,“居于较高之列”^[10]。1931年,清华的岁出经费约125万,在全国各大学中排名第五位。但与国外大学相比,相差甚远,譬如1931年“哥伦比亚大学本年的预算,共有三千六百万美金”^[11]。在实际运营中,清华曾长期处于经济拮据的状态下,办学经费曾出现过“庚款停付”^[12-13]的实质性短缺^[14]、“事业扩充”^[12]的建设性短缺和“反对浪费”“撙节经费”^{[11][15-16]}的控制性紧缩等现实困难。

相比国内其他大学而言,清华经费较为充裕、稳定,每年拨付确定的预算支持采买文献。1931年,《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所登刘本钊^①《二十年来清华之财政》一文,强调了书籍采购的重要性并介绍了图书购置费分配计划,“学校之良,每视内容是否充实,而书籍仪器之购置,为学校充实内容最重要者。”“按校务进行计划大纲之规定‘图书仪器购置费,至少当占总预算百分之二十’,则此后本校图书仪器之购置,尤当有多量之增加也。”从清华年度收

①刘本钊,1928年前后任清华会计科科长。



支和购书经费^[17-18]看,自民国元年起,全校购书支出占比连续 17 年波浪式攀升,到 1929 年已超过 11%。目前掌握的 1920 年^[4]、1935 年^[2]和西南联大时期^[19]学系购书花费明细,为了解各科、学系、研究所的购书经费使用情况提供了依据。需要指出的是,清华的专业文献曾以各科、学系、研究所等校内机构为单位组织推荐购买^[7],各科、学系、研究所的购书经费即推荐购书经费。

清华的文献购置工作在上述经济背景下展开,推荐购买类购书经费在年度购书经费中占比较高,充分体现了清华对于推荐购书工作的倚重。1920 年,包括物理、化学、数学在内的 23 个学科领域的推荐购书预算合计 8500 元,约占全校年度购书总预算的 78%。到 1935 年,包括生物、中文、土木、电机在内的 30 个学科领域的推荐购书预算合计 152160 元,约占全校年度购书总预算的 90%。西南联大时期经费和采购困难,图书馆文献采购近乎全部由学系推荐购买,包括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历史社会、哲学心理教育在内的 17 个学科领域的推荐购书预算合计 35000 元,占到了学校全年总购书经费的 98%。

3.2 预算办法

清华图书馆购书费“向无定额,系由学校随意拨给。民国九年(1920)起,始立预算^[18]。”戴志骞曾以图书馆主任、图书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创建并参与学校图书购置预算规划。沈祖荣曾于 1922 年言及清华图书馆预算,“戴君志骞以图书专家,详为布置,规定每年购书费为二万元^[20]。”自 1920 年至西南联大时期,清华购书预算方案经过四次大调整,曾出现过四种分配和使用模式:(1)图书委员会负责制:1919 年,清华“图书委员会”成立,“由该会负责,决定预算之支配”^[3]“图书委员会将一部分购书预算,分配与各科。然后由各科教师介绍须购之新书^[7]。”(2)学系按需申报制:自 1925 年起,清华改为大学后,荐书预算及其支配权归各学系及研究所,“每年购书费之多寡,均有各学系及研究所教授自定之^[21]。”(3)学系平均分配制:至清华南迁,西南联大成立,购置工作各项流程更加完善,唯有购书经费曾调整为按系平均分配不尽合理。1938 年 6 月 2 日,西南联大哲学心理教育系主任汤用彤写信给国立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以系务会名义对 1937 年长沙临时大学购书预算按系平均分配方案提出质疑,“如依系为单位之原则则自属公允,但就哲学教育心理三学科之内容与

范围言之则本系之预算实嫌不足”^[22]。(4)结合学系需求的平均分配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购书办法对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的经费平均分配方案作出优化调整,开篇便明确购书费分配原则会考虑学系需求,“本馆购书费之分配由图书委员会斟酌各学系情形于编制预算时决定之”^[23]。“各系购置图书应以各系图书经费预算所列之款数为限”^[24]。相比之下,由需求方提出预算申请,在经费许可的前提下按需分配,使专业文献的采购更加便利,是较合理的预算模式。

3.3 参与方及人员

文献购置工作链条上,由教员、职员、学生、书商等校外内人员组成的荐书群体与购书审批方、接洽方、采购方、供书方、付款方共同协作,完成从提出购书需求到图书采购入馆整个购置流程。

荐书人员开始仅限于科主任,随着预算的增加,全校教员均可参与。随着购置制度的发展,参与荐书工作的各方人员不断调整,逐渐趋于合理并稳定(如表 1 所示)。清华购置图书的最终购买决定权最初在校长手中,后转到图书馆主任,再到图书委员会。出于推荐数量太多、经费无力购买和学科统筹考虑,增加了学系审批人即各科教授和教授代表。1926 年,又因统筹需要,将学系审批人调整为系主任。学系作为审批方之一主要负责专业文献种类、内容、质量、价格等方面的把关和挑选,能够决定文献采购与否。这些推荐购买活动的审批决策方人员均为教授,也即称为教授决策购买为主体的购置制度的原因。另,图书馆作为购置制度的参与方之一,对购置预算管理、流程管理和文献采购工作负主要责任,并曾作为审批方之一负责文献采购前的查重和经费落实,切实推动推荐购书制度的执行和发展。

清华文献购置参与人员的历次调整受经费和采购理念这两个因素的影响最明显:与购书经费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关系,经费紧缩参与推荐的人员范围缩小、精简,经费充裕参与推荐的人员范围扩大。清华的采购理念具有“尊重专业”和“重视统筹”相结合的特点。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学系和教授参与度逐步提高,专业文献均汇集到相关学系,由教授审定购买,普通书刊的选购也会尊重教授意见。整体来看,将购书参与人员安排与经费、采购理念等因素统筹考虑,文献购置从方法设计到实施更加规范化、合理化。



表 1 清华图书馆文献购置主要参与方及相关责任人

参与方	雏形期 (1914—1918)	调整期 (1919—1927)	定型期 (1928—1937)	成熟期 (1938—1948)
荐书方	科主任	初为教员、职员,调整后同学也可参与	教员、职员及同学	西南联大时期为系主任和著名教授,复员后为教员及同学
审批方	校长、庶务长	初为图书馆委员会内的科教授,调整后为学系会与图书馆主任两级审批	系主任与图书馆主任两级审批	系主任与图书馆主任两级审批
接洽方	科主任	科教授代表	系主任	系主任
采购方	图书馆	图书馆	图书馆	图书馆
图书提供方	书刊发行公司	西书及新书为发行公司,中文旧书为旧书肆或私人藏书	西书及新书为发行公司,中文旧书为旧书肆或私人藏书	西书及新书为发行公司,中文旧书为旧书肆或私人藏书
付款方	庶务处	初为庶务处,后为会计处	会计科	会计科

3.4 工作流程

1938年以后,购置工作进入成熟期,成为一项校级制度,经历了长期运行考验,主体流程已基本固定(如图1所示)。文献采购需求初分为专业文献和普通文献两类,专业文献的采购使用推荐购买的方式,普通文献采购图书馆大都自行处理,少数需会同学科教授磋商。清华图书馆设立有专门接收和处理文献推荐购买工作的处理流程,专业文献推荐者需填写制式介绍卡片(如图2、图3所示)或撰写荐购信,将所荐文献题名、出版发行信息、价格、推荐理由等内容列于推荐书单之上,又或直接在书目单、新书发行信息页上勾选、批注采选意见。推荐加购已有馆藏,则需要特别说明加购理由。已经有确定采购来源的文献,可标明采买渠道。购置工作执行学系与图书馆二级审批制度:荐书单先交学系审批,由学系确定购买意向并核查价格是否符合预算;后由系主任对审定的书目单再次进行审定、署名签批并加盖系章;交图书馆审核的荐书单,重点在于查重和核查预算,超出预算仍需购买的文献,需经系主任报图书馆主任呈校长特批。随后,图书馆会将书单中文献分为“照购”和“勿购”两类,“照购”的文献会据来源渠道分别生成购书单,购书单是图书馆交与书商或出版发行公司的采购凭证,经图书馆主任或经手人签字盖章并登记“书字第×号”后生效。购书单会在显著位置注明推荐每种文献的学系,以便采买经费的归口使用。无论文献能否采买成功,图书馆都会将审批和采购情况通知学系和荐书人。

3.5 审批标准

“符合预算”和“不设复本”是图书馆的两条基本采购原则,学系推荐购买的文献如果图书馆未收藏且在预算范围内,均可采购。实际上,推荐文献最终是否会被采购,除了与文献的价值、价格是否在预算范围内等因素有关,也与执行的审批标准有直接关系。综合购置文档可知,除了两条基本采购原则,审批人会综合考虑文献的用途、质量、重要性、价款虚实等因素,并以此决定是否采购。对于特殊情况还会特殊灵活处理。现列举学系主任签批的两例文献如下,以初步了解审批标准的执行情况。

1926年,朱自清为阅览便利请图书馆增加《增补丛书举要》复本一套,他于推荐信笺中签批了此书的馆藏状况和购买理由:“此书校中有两部,一在研究院,二在编目室。阅览室中无此书,殊感不便,故请添购一部。有此一书,阅览者即多有利用丛书之机会”^[25]。《增补丛书举要》已有馆藏且有副本一套,按“不设副本”的采购原则,此书不应再获批准,但事实上此书仍获批准购买。可知,用途也是决定是否采购的标准之一,且该标准的执行优先级在“不设复本”之上。1926年,研究院主任吴宓特允王国维采购《蒙兀儿史记》,吴宓在推荐信中签批:“王静安先生由天津购来蒙兀儿史记一部 价洋陆圆(此洋王先生代垫)此书藏本珍稀外间颇不易得请即加盖印章列入书库并备洋陆圆归还静安先生作为研究院购置为荷”^[26-27]。可见,稀见文献凸显重要,因文献重要甚至可以执行先购后批的灵活购置流程。

2021年第6期 大学图书馆学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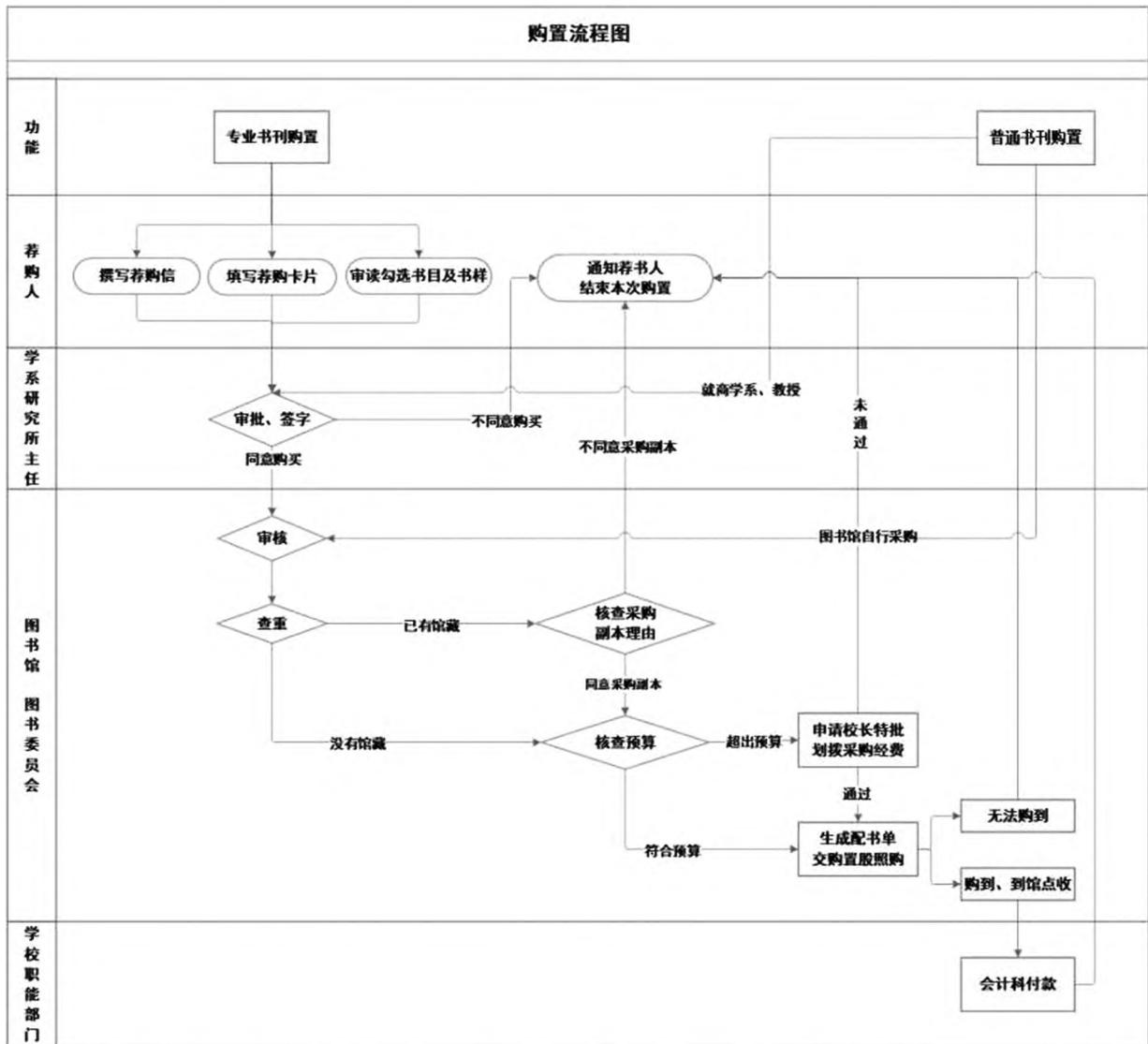


图 1 成熟期的文献购置主体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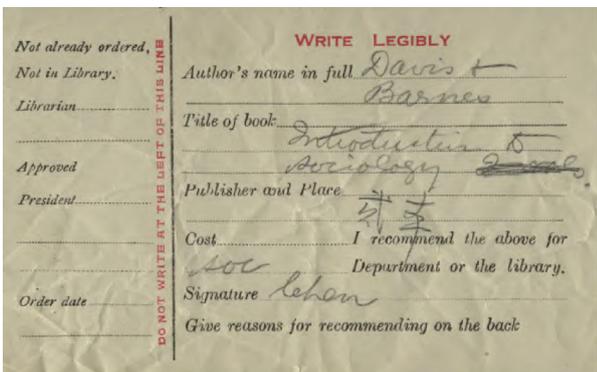


图 2 1929 年社会学系主任陈达用英文制式的荐书卡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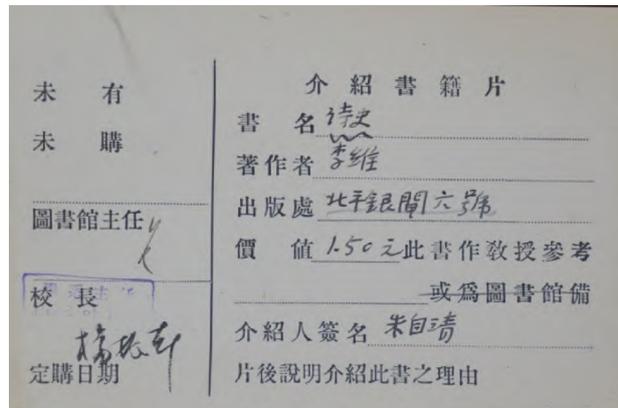


图 3 1928 年前后清华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用中文制式的荐书卡片

2021 年第 6 期
大学图书馆学报

4 购置制度的运转成效

清华教授决策的文献购置制度从 1915 年发端

到形成特色制度,经过三十四年的漫长发展历程,一直沿用至新中国成立,表明其较好地满足了各参与



方的某些特定需求。众多教师、职员、学生、学系、图书馆等校外人员、机构参与其中,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购置制度的意义和价值。

第一,凭借购置制度,清华图书馆快速积累起一定规模、高质量的专业文献。

清华馆藏从无到有,快速获得大幅增长,又度过战火毁坏、复原重建难关,较快恢复到战前水平,除了得益于经费保障,还与图书馆所采用的购置制度密不可分,清华购置制度的主体即推荐购买。清华建校初期为学堂建制,图书馆无旧藏,建校从搜集图书开始,1909年学堂开学时仅有藏书两千多册^[28]。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到1930年代初,清华“中文则已有十四万余册,西文书已有四万数千册^[18]。”藏书总量在全国四十一所大学中次于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位居第四^[29]。1937年至1946年,西南联大时期购书经费紧张,采买也异常困难。西南联大图书馆采取了学系主任、知名教授推荐选书的购置制度,教授在有限的预算下精心挑选图书,减轻了特殊时期的入藏困难。待1946年复员后,清华图书馆能够采集到优质的文献,从战争损失中快速积累起优质的文献,完善、独特的购置制度功不可没。校长梅贻琦发动中文系主任教授朱自清、在美清华教授冯友兰等、在美博士生校友参与选购图书。又有北平收回、昆明运回、联大分书及赠书入藏,至1948年4月馆藏图书已基本恢复战前水平^[30-31]。《清华大学古籍善本书目》收录了馆藏善本4600余种,将书中所提楚辞、杜诗、易经三类专题珍本文献与购置文档比对,发现部分善本文献来自教授推荐。

第二,较好地满足了校内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文献需要。

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产生的文献需要是教师参与推荐的驱动力之一,清华购置制度为满足这些实际需要提供了经费、人员等各项采买保障,所以自该制度产生就得到教师群体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清华由此形成了一股推荐之风。

学系教授的荐书信中常见到该书用于某课程或指导学生等有关文献用途的描述,显示出所荐文献对于当时学校教学的助益作用。1929年,时任清华社会学系主任陈达(Chen Ta)推荐英文书籍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社会学概论)(如图2所示),荐书卡片背面有用途说明,“此为社会学课本”^[32]。1932年,数学系教授杨武之、郑之藩联名推荐中译

本《微分方程》并说明用途为“留作微分方程班学生参考之用”^[33]。

民国时期,清华知名学者云集,他们荐书、阅书、著书立说。有教授在荐书时便说明该书用于某项研究或某著书任务,也有教授系统推荐所研究某个专业领域内的书籍,显示出荐书与科研之间的关联关系,即荐书促进学术产出。如1933年5月,中文系急购《历代诗话续编》,朱自清批示并叮嘱图书馆“此书系中国文学系编纂诗话人系之用,购来即须分别剪贴,请勿登录为荷”^[34]。此书后为朱自清所用,编成《诗话人系稿本》^[35]。

第三,满足学生的阅读需要,发挥育人作用。

荐书的首要意义是有高质量的图书供读者阅读。民国学者所荐文献学术价值高,不仅满足了当时的阅读需要,有些幸存文献还带着名家题跋、批注、借阅记录等历史痕迹辗转流传,成为馆藏珍贵文献,至今仍被大学生读者阅读参考。民国时期清华教授、学者所荐书单是书目也是治学的法门,书单上列举推荐理由是教授对于专题领域研究成果和现状的解读,为学生研读提供了线索,对于指导学生阅读颇具针对性。

购置制度为学生提供了一种购书渠道。学生是校内的庞大读者群体,他们因为课业、研究选题和阅读兴趣产生大量的文献需求,这些需求大部分已经通过教师推荐得到满足,少部分未被覆盖到的文献才会被学生推荐。学生积极参与选书、荐书,锻炼了利用图书馆和参与公共资源建设的能力。所荐书籍如得到学系和图书馆的认可,学识和自信心就会受到鼓励,这种经历起到的教育作用是对学校专业教育的一种有益补充。

第四,清华大学学系的创设和发展建立在文献购置的基础之上。

清华自1924年起停招高中两科学生,1925年开办大学,1928年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学系之废设极为频繁。1926年,时任清华校长的罗家伦在其《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中指出图书和仪器的扩充“至迫切重要”,提及1929年“市政工程 and 地理两系就要正式开办,清华关于这两系的设备图书,尤须注意”^[15],采办图书对于学系建立之重要可见一斑。

清华荐书教授中不乏各学系成立之初的参建者、首位系主任等学系元老级人物,已知79位荐书教授中22位曾担任过学系主任,明确主持或参与过



学系创办工作的有社会学系陈达、哲学系冯友兰和金岳霖、生物系刘崇乐等 10 位,他们将购置文献视作学系创办和发展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举例证一则如下,1925 年,清华学校设立研究院,研究院开办之初,主任吴宓和教授王国维便亲自入琉璃厂书肆寻访书籍^[36],此后又多次入琉璃厂挑选书籍^[37],足见书籍对于办学的重要性。

第五,对国内图书馆采购业务的发展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促进了校际、馆际交流与合作。

1926 年,戴志骞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学术刊物《图书馆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发文,将清华的推荐购书经验介绍给同行,“以供参考”有推广应用之意。事实上,早在 1918 年,清华的购置办法已经开始对北京大学产生影响。1918 年 3 月 15 日,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率馆员到清华学校参观,关注到当时清华图书馆的购置工作并有专门描述^[38]。北京大学从 1920 年起设立购书预算和购书办法^[39],采用了教授决策购置办法,发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参观并了解清华的购书办法之后,购书思路与清华如出一辙,略知清华对大学图书馆采购业务的带动作用。已知在民国时期开展图书推荐购买业务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1918 年,顾颉刚所作《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介绍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由学生推荐购置图书的方法,1930 年前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钱玄同参与了购置^[40]。另外,1923 年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应清华学生邀推荐国学书目^[41],并被清华图书馆照购^[42]。1933 年到 1947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文献学家赵万里曾多次受中文系所托为清华图书馆荐书、访书。民国时期大学之间、图书馆之间通过图书购置发生互动,促进了交流与合作。

第六,作为文献收藏的一种手段,保护了国家的重要文献。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法、德、美、英等国的收藏家、游历家、传教士,以及国内专为西方文化机构、私人搜访古籍的掇客,也频繁光顾中国旧书铺、寺庙,并从中发现若干无价的古本孤刻,运往海外。1932 年,署名西生的作者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强调了收藏古本中文刊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该文同时号召清华担当保存典籍的使命^[8]。

清华因购书经费稳定,加之教授慧眼识书,是早期进入市场采集古旧文献的较大买家之一。以清华

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等社科类学系为代表,一批批懂书爱书的师生依托推荐方式,收集近代资料。正如汪鸾翔荐《钦定明鉴》时言明,“此等书将来愈少愈贵如此时能预为搜罗似不为无益也”^[43]。这些文献资料采购入图书馆后得到妥善保管,保护并延续了文脉,此举于国家乃幸事。

5 启示

如今,文献购置制度经过不断发展调整,在清华运行已超过百年,以清华为代表的大学图书馆经费充足,采买文献渠道多样且便利,学系教授已很少参与图书馆保障性文献的推荐购买工作,图书馆一度失去了对学系荐书的依赖性。但是,随着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图书出版的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大量新兴学科出现;特藏文献收藏和使用热度攀升;以图书馆采访馆员为中心的采访模式已不能满足所有层次读者的需求。而推荐购买作为一种曾经广泛使用的采访方法,以读者需求为导向,以专家决策为依据,在优化馆藏资源结构,满足图书馆特殊种类文献采购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苦于读者参与积极性不高,该项工作的开展并不顺利。总结并利用民国时期购置业务的运行经验,寻找其与现今文献采购工作的结合点,对于重新认识并发挥荐书效益,调动读者参与购买的积极性实有裨益。

首先,明确适合推荐采买的文献资源类型。现在各大学图书馆经费相对充裕,可以大量购买各种资源,包含普通专业书刊在内的保障性文献仍可由采访馆员采购,不确定的保障性采购可就商学系专家。不同于保障性文献的采购,大宗文献、采买困难的文献(如港台文献、罕见文献、老旧文献、外文文献)、整体购进的专题文献及特藏文献等补充性文献和特殊种类文献,由于采购经费高、寻访困难,学系或师生凭借单位或个人获取难度大,适合以推荐购买的方式由图书馆采购或图书馆与学系联合采购。

第二,建立特藏文献等特殊种类文献的长效购置机制。如今特藏文献等补充性文献与民国时期的文献购置有一些类似之处,都是通过访求、引荐、自荐所得,文献入藏价值的判断与荐书人和审批决策人的专业眼光和学识有直接关系。基于此,效仿民国时期的购置制度,建立适合现代特藏文献的购买机制,能够扩大文献来源范围,引入更多的入藏机会。如果能将购置制度上升到学校层面,多方号召,



从上而下推行,或可长久保持图书馆特藏文献采购工作的执行力度和成效。以清华图书馆地方志和地方法文献建设为例,2007年到2011年,得益于校领导自上而下的推动,清华大学曾有过一段大规模的地方志和地方法文献收藏发展历史,在短短四年时间内迅速建立起一定规模的地方志文献馆藏^[44]。以专题入藏的特藏文献往往伴随着长期持续的收集工作,只有以教学和科研文献需求为导向,将特藏文献建设与需求紧密结合,建立起图书馆、学系或学校层面的广受认可的特藏文献购置制度,专题特藏文献的建设工作才能长期有效开展,如果只是将其与某位领导绑定,随着领导的换届,该类文献收藏便可能被迫停顿。

第三,通过确立合适的受益关系,调动专家参与购书的积极性。目前,清华大学图书馆在特藏文献入藏前一般都会请相关领域专家出具鉴定意见,以明确文献价值,从而判定是否入藏。在这种购置机制下,鉴定专家等同于推荐方,其鉴定意见等同于推荐理由。由于专业的相关性,鉴定专家大概率成为所荐文献的读者。民国时期,作为荐购福利之一,所荐书籍有些会作为参考书供荐书教授教学科研之用,有些甚至直接入藏到发起推荐购买的学系,从而引发一些与其他读者的使用矛盾。以史为鉴,鼓励专家参与特藏文献的采购入藏和组织整理,合理安排专家及相关学术团体使用所荐文献,同时兼顾其他读者的使用需要,才能充分体现购置机制的优越性,调动参与积极性,从而充分开发文献的使用价值。

参考文献

- 庄泽宣.筹办清华大学专门科文理类意见书[J].清华周刊,1925(353):47.
- 二十四年度各学系及图书馆购书费支数及待付数[A].清华大学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2:1-100-8.
- 戴志骞.清华学校图书馆概况[J].图书馆学季刊,1926,1(1):94.
- 刘聪强.清华图书馆[J].清华周刊,1920,增刊(6):17-18.
- 曹云祥.清华学校之过去现在及将来(清华之教育方针目的及经费)[G]//清华大学史料选编 第一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36-44.
- 学校方面:图书馆新书[J].清华周刊,1923(274):20.
- 学校方面:图书馆 1926年3月12日访图书馆主任戴志骞先生[J].清华周刊,1926,24(5):297.
- 酉生.关于图书馆[J].清华周刊,1932,37(1):115.
- 清华学校组织大纲(1926年4月15日定)[J].清华周刊,1926,25(2):160.
-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1:56-57.
- 梅校长到校视事 召集全体学生训话[N].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1-12-4(1).
- 梅贻琦.五年来清华发展之概况[J].清华周刊,1936,向导专号:2-7.
- 二十二年度学校开学志略[N].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3-9-15(1).
- 梅贻琦.清华一年来之校务概况[J].清华副刊,1933,39(7):3-5.
- 罗家伦.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J].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8(12).
- 二十五年度开学典礼纪事(摘要)沈秘书长报告[N].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6-9-21(2).
- 刘本钊.二十年来清华之财政[G]//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 第一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435,440,443.
- 洪有丰.二十年来之清华图书馆[G]//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 第一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453-454.
- 西南联大关于图书经费等问题的笺函[G]//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 第三卷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80-181.
- 沈祖荣.民国十年之图书馆[J].新教育,1922,5(4):784.
- 戴志骞.清华学校图书馆之过去,现在,及将来[J].清华周刊,1927,27(11):552.
- 请学校酌量增加本年度本系购书经费[A].清华大学档案馆档案,档案号:X1-3:2-211-4.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购置办法[A].清华大学档案馆档案,档案号:X1-3:2-18-67.
- 图书设计委员会 28年度第一次会议记录(1939年10月11日)[A].清华大学档案馆档案,档案号:X1-3:2-211-22.
- 朱自清荐购《增补丛书举要》信笺[A].清华大学图书馆荐购文档,文档号:126-1-38.
- 会计科给王国维代购《蒙兀儿史记》的付款凭条[A].清华大学图书馆荐购文档,文档号:44-2-7.
- 吴宓就王国维代购《蒙兀儿史记》致信图书馆主任[A].清华大学图书馆荐购文档,文档号:155-1-12.
- 韦庆媛,邓景康.清华大学图书馆百年图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4.
- 全国各大学二十年度之藏书量与在校师生及经费设备比较表[J].图书馆学季刊,1933,7(4):654.
- 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概况(1947年4月)民国三十六年校庆写印[A].清华大学档案馆档案,档案号:1-4:2-45:1-25.
- 梅贻琦.复员后之清华(续)(1947年4月)[J].清华校友通讯,1947(2).
- 陈达推荐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的荐购卡[A].清华大学图书馆购置文档,文档号:72-2-19.
- 数学系教授杨武之、郑之藩荐购《微分方程》的信笺[A].清华大学图书馆购置文档,文档号:89-1-4.
- 朱自清荐购《历代诗话续编》的信笺[A].清华大学图书馆购置文档,文档号:104-1-2.
- 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118-119.



- 36 研究院:添购书籍[J].清华周刊,1925(352):80.
 37 吴宓等赴琉璃厂订购书籍信笺[A].清华大学图书馆购置文档,文档号:26-1-5.
 38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 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5-188.
 39 北大的图书馆:图书馆的历史[J].北大生活,1921(12):23.
 40 钱玄同先生与北师大——从其买书、借书、捐书、荐书说起[EB/OL].[2021-01-05]. https://www.sohu.com/a/219872533_488227.
 41 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J].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1923(2):38.
 42 胡适先生介绍之书籍[A].清华大学图书馆购置文档,文档号:126-1-53.
 43 汪鸾翔荐购《钦定明鉴》的信笺[A].清华大学图书馆购置文档,文档号:155-1-17.
 44 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方志馆揭牌[EB/OL].[2021-01-05]. http://www.lib.tsinghua.edu.cn/about/newlibrary/newlibrary_news_021.html.
-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100084
 收稿日期:2021年3月15日
 修回日期:2021年5月6日
 (责任编辑:支娟)

Operation Mechanism, Effect and Enlightenment of Library Acquisition in Tsinghua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ong Lin

Abstract: Since 1915, literature recommendation and acquisition began to appear in Tsinghua. Befor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recommendation and acquisition system based on professor's decision-making, has been running in Tsinghua University for 34 years. Based on the in-depth collation and review of literature, history archives and documents of recommendation and acquisition collected by Tsinghua libra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acquisition of Tsinghua library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expounds its enlightenment to the current library acquisition.

Keywords: Library Acquisition; Recommendation;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singhua University



(接第 92 页)

Reverse Thinking on Harvard Libraries Reorganization

—Research on the Core Problems of Branch Library System in Domestic University Libraries

Fan Chenxiao Du Yuandong Han Songtao

Abstract: Harvard Libraries has undergone two rounds of restructuring, and the issues that remain unchanged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and studied, which include: keeping the printed collections as the main academic resources, keeping the specialty and diversity of knowledge, and decentralizing independent academic library systems. Based on the th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key issu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ranch library system in domestic university libraries, including the importance of independent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 in branch libraries, integrating the existing related roles of libraries, namely, to redefine the functions of discipline experts in departments, discipline literature experts in libraries and acquisition librarian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proposed to set up a branch library academic resources committee to integrate the resources acquisition between disciplines and libraries.

Keywords: Harvard Libraries; Branch Libraries System; Resource Construction

2021年
第6期
大学
图书馆
学报